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我国城市社区情感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陈文

西安交通大学，陕西西安，710069；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物质文明的现代化，还是精神文明的现代化。社区作为国家的基本构成单元，在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基础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制度和技术的重要性被高度强调，人的情感在治理中逐渐隐没。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随着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的下移，治理价值的情感回归也应当紧随其后。基于此，本文探究城市社区情感治理在我国兴起的理论基础、历史渊源和实践必要，从结构性和交互性两个层面归纳我国社区情感治理的现实举措，并从情感的生产、联结和异化三个环节分析我国城市社区情感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以期促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社区；情感治理；情感困境

DOI：10.69979/3029-2700.24.5.020

1 我国城市社区情感治理的兴起

在理论起源上，社区治理源于对消极情感的回应。社区一词最早由滕尼斯提出，表示的是一种共同体精神，因而社区在本质上是具有亲密情感的社会共同体。二战之后，人们开始运用社区民间资源、发展社区自助力量以应对疾病、失业、贫困等问题，美国学者法林顿基于此提出了“社区治理”概念。因此，社区治理的原初宗旨是协调多元主体实现公共事务，来回应战争创伤给人们造成的普遍性消极情感。

在历史渊源上，我国城市社区情感治理源于“情本体”的文化根源。情感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社会的核心关切，西方的文化土壤孕育了节制德性传统，提倡以理驭情，国家被认作是理性公民权力让渡形成的保护公民权利的暴力机器；而中国根植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是将情感视作治理核心的“感性国家”。无论是封建时期的朝代更迭、革命时期的情感动员还是国家建设时期的合法性重建，中国都强调以人为本，重视对民众积极情感的唤起。在现代化基层建设中，我国逐渐从单位制向社区制过渡。单位制时期资源与所属单位挂钩，个人对单位处于全面依附状态。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单位逐渐转变成单纯的工作场所，不再提供个人所有的资源，原子化个人被市场潮流助推进入不同的社区。因此，引入情感话题，强化居民联系，激发居民归属感，塑造共同体精神历史之需。

在实践必要上，我国城市社区面临着情感转向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个体逐渐成为基层自治主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突出，然而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政治经济文化情感等多维度多面向的干扰，社区传统的文化资源来回应居民多元化、差异化的情感需求已力不从心，传统的理性治理模式难以适应社区治理的复杂现状。因此为应对社会结构转型发展，回应居民情感需求的多元化问题，不仅要检视以往治理实践的局限性，还要从价值层面呼唤理性与情感的双重回归。

2 我国城市社区情感治理的发展举措

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互动构成了基层治理格局的发展，从动态和静态两个层面出发，社区情感治理的发展举措划分为结构性和交互性两种。

社区生态内部要素彼此联结，构成了稳定恒久的结构。社区情感治理的结构性举措是指通过要素的角色定位和关系调整来实现情感培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党建引领的基本格局为情感治理提供价值指引和动力源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领导核心，社区作为社会治理基本单位，在治理实践中也构建起了党建引领的基本格局。社区党组织能够直面群众需求，找准情感治理的发力点，不断塑造民众的思想和情感，其具体的实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社区党组织工作者将党的精神嵌入社区治理，与居民产生共鸣并构建起情感

共同体；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技术平台搭建党建服务平台来合并资源，形成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局面。第二，社区赋权促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情感治理。社区赋权通过调整社区的权力结构赋予居民更多的参与权和更大的决定权，能够培育多元主体的正向情感，强化居民的责任感、认同感，以情促行，促发他们积极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去，在实践中培养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并内化为自觉达到多元共治的目的。第三，创设协同治理平台，健全社区情感治理机制。在党建引领的基本格局下，社区赋权使得社区主体多元共治成为可能，而协同治理平台的创设和治理机制的健全就是推动理论成为现实的桥梁。在现实的具体实践中，协同治理的平台与机制主要表现为社区公共空间的搭建和正式、非正式的情感规约的建立。

社区情感治理不仅是对社区静态结构的调整，还包括对社区要素互动的调节。通过调节社区要素互动来推动情感的正向流动就是社区情感治理的交互性举措，主要包括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根据关系结构构建互动方式。随着传统乡土社会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差序格局的弱化，城市社区也呈现出全新特点：对青年来说，学业和就业的拓展致其对社区的情感需求较低，与社区关系较为松散；对中年群体来说，事业与生活压力花费的大量精力致其疲于维持社区关系；对老年群体来说，社会关系的减少、生活压力的减轻和空闲时间的增多致其社交需求上升，因而老年群体是社区中是情感参与最活跃的群体。基于此，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以老年人群为中心、中青年群体为外围的差序格局，并形成了以老年群体为主，中青年为辅的社区情感治理模式。第二，基于文化底蕴培育互动形式。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家国同构理念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文化已然是影响国人心理和行为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在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中，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占据了核心地位，因而老人和儿童是家庭情感的症结点；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以养老育幼为主的部分家庭功能被转移到社区中。因此打造社区家园品牌，构建拟亲缘关系是目前城市社区情感治理的重要举措。第三，价值导向和工具导向相结合的互动模式。社区情感治理在取向上分为价值导向型和工具导向型两种类别，价值导向型指社区工作人员基于自身的职业道德和政治素养完成社区工作，并通过与居民友好的沟通交流凝聚社区情感；工

具导向型指通过资源共享、利益往来和联结纽带形成利益互惠、情感互惠和邻里互惠的互惠模式来完成治理任务，主要表现为以人情或资源交换决社区难题。

3 我国城市社区情感治理的困境分析

社区情感是抽象情感在社区层面的具象化，其核心内容包含社区认同、社区依属、社区凝聚和社区满意四个方面。社区情感治理就是以情感为切入点，关注居民在治理中的情感需求，运用情感策略试图打破社区治理以制度和技术为核心的治理传统，实现情感的柔性治理和以制度、技术为主的刚性治理的融合。然而在治理实践中，从情感的生产、联结，再到情感的保持都容易存在阻碍。

首先是情感的生产困境。情感生产是通过情感或其他原材料的投入生成额外价值性情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面临着制度、心理和效率的三重困境。城市社区治理体制继承了以绩效为本的政府工作制度，容易忽视工作者的情感劳动，致使工作者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再加上社区工作者承担着倾听者和关怀者的角色，要对居民的负面情绪做出积极回应，在持续性情感投入的过程中，工作者极易产生超负荷的情感疲劳和职业倦怠，这在根源处影响了社区正向情感的持续生产。

其次是情感的联结困境。在社区场域中，情感联结是指情感关系的构建，它既是情感治理的过程性手段，也作为结果性目标，是衡量情感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准，然而在治理实践中，情感联结受到氛围营造和认知取向的限制。以血缘、家族为纽带的熟人社会关系在现代化发展中逐步瓦解，人际关系趋向淡薄，工作人员难以快速融入群众并建立起与居民的沟通纽带。且社区工作者作为情感联结的实施主体，一方面极易被各种事务束缚，在主观上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保持和维护情感联系；另一方面，情感的脆弱性和时效性要求工作者持续的情感投入，但认识和能力的局限难以维系正向情感的持续积累。

最后是情感的异化困境。社区积极的情感关系不仅有益于工作者平稳高效地推动工作开展，还有益于居民对社区形成良好的情感期待。但是，情感具有复杂性和不稳定性，限度外的情感联结容易引发情感异化的问题。首先是民众情感异化的风险。社区作为居民的生活场所，居民能够直接接触到社区工作者，因而在生活中部分居民会利用情感联结在处理现实事务的过程中攀附关系，

形成遇事便找工作人员的固化思维模式,造成社区工作系统的负累。其次是社区工作者情感异化的风险。社区情感既能实现正向流通,也会形成复杂的人情关系,部分工作人员目标异化为对物质与地位的追求致使社区情感沦为谋取私利的资本和手段。

4 我国城市社区情感治理困境的对策建议

客观梗阻和主观局限并不能否定社区“情感”的价值回归,为实现社区治理的情理兼备,在综合考量城市社区情感治理困境的基础上,要从理念、实践和规范三个层面培育、塑造和保持正向情感,完善情感治理的实践进路。

理念层面:培育情感治理意识。观念意识指导着工作者在社区中的具体实践,培育情感治理意识不仅要培育社区工作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责任感,还要挖掘拓宽情感联结的路径。首先,培养社区工作者的责任感要求其在处理社区事务中主动投入情感,时刻关注居民和利益与情感需求,对社区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了解,进而切实化解社区矛盾和解决社区问题。其次,促进情感联结的持续性与稳定性要求社区工作者在治理实践中不仅要做到意识内化,还要做到行动外化,通过搭建情感治理的线上平台,使得居民诉求得到充分及时的表达,激发民众的参与积极性,从而提升情感联结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实效性。

实践层面:提升情感治理素养与能力。社区工作者的素养和能力直接关切到社区治理成效,因此基层政府要聚焦社区的具体实践,为社区工作者提供知识技能培训,通过开展专业而系统的知识技能培训为社区情感治理的实践与发展提供切实帮助,推动社区治理从由行政化向全面化、专业化的转变。此外,社区者还要主动学习,自我反思,从外到内地提升自身素养和能力。社区工作者主动加强情感治理的知识技能学习,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和参加相关讨论会,构建起自身的知识框架,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反思自己的工作,使得静态的知识技能得到动态化的发展,有效抑制情感发生异化的可能性。

规范层面:构建社区情感治理良好基础。完善的规范体系可以抑制社区情感异化的风险,在合理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治理效能。针对我国城市社区情感治理规范体系不完善的问题,要积极推进制度创新,通过不断修正和创新原有的制度内容在制度规范层面上构建社

区情感治理的良好基础,在具体实践中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创新情感治理制度设计。城市社区情感治理需要打破基层组织传统的以绩效为主的考核机制传统和以结果导向的目标机制,将社区工作人员的情感劳动纳入考核范围,并建立过程监控系统,以奖惩机制促发社区工作人员的情感投入与情感劳动,并以过程监控实时跟进分析情感治理在运行中的缺陷,推动社区情感治理全过程优化。其次,创设情感问题疏解空间。在社区情感治理实践中,社区工作者同样会产生职业倦怠、价值感低等的情感问题,因而需要建立排压基础设施和提供精神健康诊疗为工作人员留有情感疏解空间,减少社区情感治理中不可控的情感障碍。

5 结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我国的国家治理仍需不断改进。治理理论起源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原初宗旨也是西方世界的发展在其他世界的渐入,尽管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的优秀经验值得借鉴,但西方理论植根于西方的社会土壤,并不具有世界普适性。我国国家治理发展不仅要借鉴西方优秀经验,还需建立文化自信,以问题导向扎根中国实际,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创新发展。社区情感治理凸显情感的价值与工具尺度,强调“人”的核心地位,致力于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国家治理本土化的重要突破口,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上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潘小娟.基层治理中的情感治理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1(6):6-10.
- [2]熊万胜,刘慧.社区折叠:打造熟人社区的梦想为何难以实现[J].探索与争鸣,2021(12):98-109+2+179.
- [3]田先红,张庆贺.城市社区中的情感治理:基础、机制及限度[J].探索,2019(06):160-172+2.
- [4]罗朝明,王晓涵.激情、节制与好生活:西方情感治理话语的兴起[J].江海学刊,2018(04):101-111.
- [5]孙璐.社区情感治理:逻辑、着力维度与实践进路[J].江淮论坛,2020(06):139-144.

作者简介:陈文(2002年1月),女,汉族,江苏省连云港市人,硕士研究生,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